

高陶事件幕後

萬 墨 林

滬上往事之八

陶希聖的當頭棒喝

在汪精衛的一行之中，有兩位立場不同，地位特殊的重要人物，一位是刻在台灣陶希聖先



周佛海的廬山真面目

生，一位是旅居美國的高宗武先生。他們兩位根本就不贊成「和平運動」、「組織偽政府」，而且時刻都在諷勸汪精衛夫婦迷途知返，脫離虎口。陶希聖先生曾經在重光堂會談將近結束，「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」亦即「日汪密約」的打字油印本印出來以後，在汪精衛之妻陳璧君跟前指明了說：日方所劃分的五個地帶並未包括外蒙、新疆、西北、西藏和西南，那正是上列五個地帶老早已被蘇俄和中共劃了出去。他說日汪密約就是繼續蘇瓜分波蘭以後，再由日蘇瓜分中國的大陰謀。他認為日汪密約等於是一個侵略大藍圖裏面的小藍圖。大藍圖是德、義、蘇、日瓜分世界，小藍圖是日本把我們的東北、內蒙、華北、華中和華南分做五層，最深的一層是偽滿洲國，第二層是偽蒙疆自治政府，第三層是華北，第四層是華中，第五層是華南。而海南島和台灣則同被列為日本的軍事基地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吃過早飯，陳璧君再邀陶先生談話，她跟陶先生說：

「昨天我把你的解釋轉告汪先生，我說得完全，也不詳細。不過，我一面說，汪先生却在面流淚。他聽完之後對我說，日本如能征服中國，就來征服好了。他們征服中國不了，要我簽一個字在他們的計劃上面，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。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。我若簽字，祇不過是我的賣身契吧！」

於是汪精衛、陳璧君兩夫妻私底下商量。汪精衛本來在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有一幢房子，他決定搬過去住，同時發表聲明，停止一切活動，然後離開上海到法國。陳璧君因為有一支偽軍葉蓬所部是聽汪精衛指揮的，她主張葉蓬把部隊開到廣州，在廣州自求生存。她請陶先生去跟葉蓬商量，陶先生就到法租界金神父路去看葉蓬，葉蓬表示把偽軍開到廣州去是辦不到的事。第一他的部隊太不成其為力量。第二，部隊移動必須日方協助。第三，到了廣州依然還是寄人籬下抬不起頭。

以上的這些事情，很快的就給梅機關長影佐

禎昭曉得了，他到愚園路求見汪精衛，直接了當問汪精衛可有這些打算？汪精衛說他即將遷往福履路並且發表聲明，停止一切活動。汪精衛說話的時候，影佐便掏出小筆記簿來摘記，記到最後一段話時，兩行眼淚奪眶而出，都落在簿子上。然後他說：

「我協助汪先生遷居，請法租界捕房佈防。並且我立刻回東京，報告近衛公，請求他出面干涉。」

近衛文麿是日本前任首相，在他的任內日本曾經和高宗武先生達成秘密協議，日本在兩年以內撤兵到長城以北，但為共同防共起見，限以內蒙為日軍駐紮區域。汪精衛便是抱着這個幻想逃出重慶來的，不曾想到他剛逃抵河內，不出半個月，近衛內閣垮台，平治騷一繼任日本首相。汪精衛上了東洋人的大當，火中取栗之舉，居然變成「偷雞不着蝕把米」。東洋人的條件越來越苛刻，拖他下水也就越來越急迫。

汪精衛被影佐的眼淚迷惑了，他以為這位原經手人能守大信，很講義氣，衷心同情他面臨進退維谷，身敗名裂的處境，從而又激起了天真的幻想。當影佐知會法捕房，出動了二百名巡捕保護汪精衛搬場，汪精衛便召集幹部，說明他和影佐談話的經過。說到影佐當他的面，眼淚落在筆記本上時，他低聲的說：

「看來影佐還是有誠意。」

陶先生立刻就站起來發言，他問：

「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淚？」

他下一句：「那是鱷魚的眼淚。」還不及說

出來。衆人即已高聲喊道：

「希聖，你太刻薄了！」

於是，會議到此也就一哄而散。第二天，陳璧君告訴陶先生說：

「影佐動身回東京去了，等他到上海再說。昨天的話暫時擱起。」

漢奸羣裏又有內奸

從此陶先生認定汪精衛夫婦已經無可救藥。

陶先生自己的處境，實在是非常的危險，所以他開始作出走的打算，派他的學生鞠清遠到香港，和住在香港的陶夫人一商量。陶夫人認為，要使陶先生脫險，第一步必需讓他離開愚園路。而離開愚園路的唯一方法，便是陶夫人帶着五個兒女，冒險入虎穴，搬到上海，免却敵僞方面的疑心。然後，再以全家住在一處為由，使陶先生自然而然的搬出愚園路來。

這實在是很好的一个計策，祇不過，一個弄不好，會連陶夫人和五位男女公子，全部陷身魔窟，很難逃得出來了。

不久，陶夫人一行到了上海，在法租界環龍路租了一幢房子，陶先生也順順當當的搬出愚園路，闔家團圓。

「日汪密約」談判，前後進行了一兩個月。

談判期間，日方人員即已牢牢抓住周佛海這一幫人的弱點，急於做漢奸官，巴望僞政府早日開張。同時，利用談判之暇，徵歌逐舞，沉溺酒色。那周佛海是出了名的「無孔不入」，他一見到女人，就彷彿是貓兒見腥，人都會得酥掉的。他因

為整天忙於混在脂粉堆裏，又怕太太發覺，所以他自已從不上麻將桌，而他太太每天必定打到深更半夜。漢奸羣裏的這幾位色中餓鬼，經常開色情派對，又把幾家長三堂子，逛成了個「貴族屠門」的新名目。甚至於三五成羣，參觀妖精打架，捉對肉搏。他們私生活的糜爛，使東洋人都看不順眼，於是每每在雙方爭執的時候，拿這些當殺手鐮，訓得周佛海等面面相覷，啞口無言。有一次，梅機關的理論家狄狄和矢野，便在會議席上，公開揭他們的瘡疤，逼他們非讓步不可，他們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「重慶時代，汪先生方面的同志，是拚命做事。而轉移到上海後所集結的同志中，與前者相比，只能說是獵官行動者，也就是說純為做官而來。汪政府和救濟事業不同，民衆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們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，汪派同志正在日本軍保護之下，他們的私生活，我們有權要求其清淨，並且排除享樂。倘若不負担義務而祇享受權利，我們在這方面有責任，因之殊感困惑。諸君應該看看，中國民衆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？現在使諸君感到痛苦的是與亞院提出的原案，把汪政府當做了『戰時過渡期處置』的畸型兒。但是，追究其由來，多半在汪派同志的實行力不足，這還不够使諸君反省嗎？」

斥責教訓，兼而有之，足使周佛海之流羞慚得無地自容。自己被人捉牢了小辮子，就隨時有嗅耳光，挨屁股的可能，其實，對方不過是日本的皇軍中佐（中校）階級而已。周佛海就由於自己已有弱點，怕揭穿，自貶身份，俯首貼耳，比

隻狗都不如。

此所以，日本人的交涉對象，就漸漸的轉移。到周佛海身上，因為他甘於被鞭策，甘於受驅使。影佐的助手犬養健，曾經在戰後發表他的回憶錄：「長江還在流着」，他便坦然自承，有一天，影佐跟他說：

「我們在辦理日華交涉之前，必須先辦好日本人對日本人的交涉。以現在的形勢而論，汪精衛對蔣介石、對中國國民，都不能不成為亡國奴了！我要開始我的防衛戰，必以孫子所謂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』的方式。我的軍旅生涯將由此告終，所以有一件重要事件相委託。請你在每日交涉終止後，回府用過了飯，再到周佛海家，跟他交換意見，看他要怎樣才能妥協？你把結果向我報告，次日我就按照周佛海的妥協意見提出新方案，那麼一切問題必可迎刃而解。」

高宗武親破了機關

試看梅機關長影佐禎昭的手段有多麼厲害，他抓牢周佛海的弱點，迫使他成為漢奸中的內奸。這也是往後日本人寧願跟周佛海多打交道的原因所在了。犬養健接受影佐的委託以後，開始每天上上周佛海的家裏密談，他為便利起見，特地遷往南京路國泰飯店，獲得上海租界的市民權，再用盡方法，從上海工部局領了五個汽車牌照，每一次到周佛海家裏，就把汽車牌照換過一遍，避免我方地下工作人員的注意。同時，他在回憶錄中也寫着，他經常為遭受突擊而緊張，他說：

「這是每晚例行的事，我由南京路西行到靜

安寺路盡頭，將入愚園路，汽車行駛需三十分鐘。夜間行車頗靜，我為備突擊，不免緊張。周佛海太太一聞車聲，即到門口相候，我和周佛海夜間折衝，雖感困難，但亦獲得相當效果。」

然而，周佛海的甘為內奸，和犬養健每夜秘密勾結，終於被高宗武先生發覺了。有一天深夜，他和犬養健在同教館洪長興會晤，便假託周佛海透露，當面將這個秘密加以戳穿。以下對話便由犬養健所自承：

「高說：『周佛海告訴我，你每晚跟他辦交涉，以你的努力，使原有的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八，不過還差兩分，仍不能達到不做漢奸的標準。縱然如此，周佛海已經在抱樂觀態度。但是社會輿論是嚴酷的，且已認為他們已經陷入賣國的絕境。我倒希望你督促周佛海，叫他自重些。』」

「我說：『我也常常對周佛海說：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吧。』」

「高說：『我看周佛海急於組織政府，反而是你慎重。不過，以中國人的立場看事情，我和陶希聖在會議席上將發表主張。』」

這位和陶先生一致努力，冀能在這一股「亂流」之中挽狂瀾於既倒的高宗武先生，他便是日本犬養毅首相之子犬養健的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同學，抗戰初期任職外交部亞洲司長，當年只有十三歲。他是上了周佛海的當，誤上賊船，以為汪周所從事的，和他一貫主張中日和平的夙願不謀而合，甚至於和中央的決策也並不違背。這當然是周佛海必欲借重他這位「日本通」，不惜昧

着良心說了漫天大謊，誘惑高宗武成為汪周對日交涉的要角。西義顯在他所著的「悲劇的證人」一書中，曾經很肯定的敘述高宗武先生的初衷：「他要日本放棄其帝國主義政策，以中國為日本對等國家待遇，這是中日和平實現之絕對的條件，亦為其前提。他要日本以事實表示，有實踐此等條件之誠意。」

犬養健在他的回憶錄裏，也記載了他們為和平運動第一次談話時的紀錄，充份證明高宗武先生上了時任代理宣傳部長周佛海的大當。犬養健說他曾提醒高宗武先生：

「『蔣委員長不動，汪副總裁出面。這樣的和平運動，不會成為反蔣運動嗎？』」

「高說：『當然需要嚴予戒備，不過，據周佛海說：絕對不會有這種事的。』」

於是，犬養毅便不勝欣幸的說：「和平運動若變成反蔣運動，那就將喪失一切了。」

當時，高宗武先生還曾強調他的立場說：「我決不做漢奸，我的和平運動界限極其明顯，即做漢奸與不做漢奸的分別。如果是不做漢奸的和平運動，雖極困難，我亦不辭。但若要我做漢奸，我就撒手，雖中途逃脫，被人目為反叛，亦在所不計。因為你是可靠的人，所以先加聲明。」

東京行險些被謀害

高宗武先生劍及履及，實踐諾言，當他發現自己受了周佛海的欺騙，再加上他參加談判，懷

覺汪精衛、周佛海所倡呼的「和平救國」，所將簽訂的「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」，實際上就是在將整個國家民族命脈斷送，他當然悲憤交集，痛心疾首。就在汪精衛一行潛抵上海，汪精衛不敢下船，留宿北光丸上的那一夜，高宗武就跟梅機關長影佐禎昭險些發生衝突，他堅欲保持行動自由，不受日方的拘束。在犬養健的「長江還在流着」一書中，對於這一幕，有很生動翔實的描寫，犬養健說：

「在重光堂晚飯後，因為汪氏這晚宿在船上，眾人各自回家，高宗武向周佛海、梅思平等說聲：『少陪』的時候，影佐能聽中國話，便問：『高君歸向何處？』」

「高說：『回法租界我兄長家中。』」

「影佐說：『這不方便，我們都是同志，此刻應該住在一處。』」

「高說：『家兄家裏，也有很週密的戒備。』」

「影佐說：『今夜還是請在這裏住。』」

「高說：『不行，我要回家。』」

「影佐便發了脾氣，大聲的說：『你是要破壞同志間的團結嗎？周君梅君不都在這裏。啊，大概是你不願意住日租界吧？不過，以汪先生為中心，我們都應該忍耐，徒求一己之清高，那有什麼價值呢？』」

「這時周佛海趕緊的說：『高先生還是請回法租界吧。』」

「於是，我便和周佛海同送高宗武到門口，宗武氣憤的說：

「『那影佐究竟有何權利？對我這個中國人發脾氣！我為和平運動，不惜以性命相拚，絕不能接受影佐禎昭的命令！』」

「言訖，他氣沖沖的上車而去，我（犬養健自稱）感覺這是不祥之兆。」

早在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四日，汪精衛一行從上海飛往日本，作初步的接洽，同行者有周佛海、梅思平、高宗武、周隆庠和董道寧。到東京後，日方即有趁此機會謀殺高宗武先生的預定計劃。因為，高先生曾阻止日方人員赴河內迎汪，且有洩露日汪勾結之嫌，此一謀殺計劃幸由犬養健的機敏與仗義執言，方告打消。

實際經過情形是：當汪精衛一行到了東京，日方安排他們住在古河男爵別墅，但却單單的把高先生摒諸於外，請他獨自一人，住到隅田川西岸林場町的大谷米太郎家中居住。所以，當犬養健前往古河別墅探望時，他發現那裏並沒有分配給高先生的房間。

犬養健大為訝異，他向接待人員探問究竟。據告：那是因為高先生「患有肺病」，為免傳染，特地把他安排到隅田川下榻。犬養健越想越不對，便趕緊前往會見「負責當局」。犬養健說，他抵步時——

「見有五六人正在那裏舉行秘密會議，一見我來，立刻緘口不語。然而眉宇之間，却仍流露得意亢奮之色，我便問道：

「『可有什麼重大事故？』」

「『並沒有什麼重大事故，我們祇不過在討論高宗武的氣色而已。』」

「『他的氣色很好呀！』」

「『聽說他需要長期休息。』」

犬養健仗義救好友

犬養健當然懂得此一回答的弦外之音——高宗武很可能會被他們毫不容情的加以暗殺。事態緊急，間不容髮，他不得不快刀斬亂麻，直截了當的問：

「昨晚我聽到有人談論，要叫高宗武喪失自由，又有人主張將他毒斃，果真有這樣的事嗎？」

座中有人回答他道：

「是有兩三個人，曾經這樣說過的。」

犬養健登時就板下臉來說：

「這不是好玩的事。退一萬步講，萬一有這種不祥的事件發生，和平運動必將因而宣告破產。我不否認，汪先生的左右，雖然也有對高宗武表示懷疑的，但是我可斷言，萬一高宗武被謀害，那麼，懷疑者立將全部起而擁護高宗武，從心底憎恨我們日本人。而一般中國人尤且較此為甚。尤其全中國人將視日本人比納粹德國更為惡劣，自茲以後，決不可能再有一個中國人贊成汪先生跟日本講和。我祇希望你們能為日本人的名譽作想，再加考慮！」

犬養健的這一席話說得義正詞嚴，慷慨激昂，兼以他當時的門第聲譽，和所處地位之重要，終於將日人謀殺高宗武先生的陰謀詭計一筆勾銷。次日，犬養健還不放心，他親赴隅田川大谷米太郎家探望高宗武。高宗武一見面便向他道謝。使犬養健胸中瞭然，高宗武先生亦非弱者，他在

古河別墅也有其部署。若非如此，他便不會毫無因由的謝他一謝了。

那一次高宗武隨汪精衛去東京，即已心知自己處境的危險，簡直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地步。然而，最令他悲憤莫名，困擾不堪的，還在於他將如何脫離虎口，把他忠誠愛國，矢志靡他的心跡表白於天下。因此，他巧妙安排，得個機會，上長崎噴濱村去走了一趟，謁見他的同鄉父執黃羣（溯初）。黃溯初是早期留日學生，民初曾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，係進步黨，研究系的一位要角，跟梁啟超、湯化龍關係很深，曾是梁啟超財政經濟的首席智囊。當袁世凱洪憲稱帝，陰謀竊國，梁啟超搭乘煤船由滬駛港，入越轉桂，與廣西督軍陸榮廷會晤，籌組護軍府、軍務院，大舉討袁。黃溯初便是偕行的六要角之一。抗戰前夕，黃溯初因經商失敗，遷居日本，在長崎從事日本語源研究。他和徬徨歧途，岌岌不可終日的高先生見了面，一席長談，曉得了高先生的內心苦悶，處境艱危，黃溯初不假思索，慨然挺身而出，他要為高先生想個衝出藩籬，保全身家性命的辦法。因此他和高先生約定：高先生先回上海，他緊跟着就來。

高先生果然平安無事，仍然跟隨汪精衛回到上海以後，黃溯初先生旋即翩然抵滬。汪精衛得到了消息，還曾東邀黃溯初跟他見過了面，一心想挽他出山，在即將建立的汪記政府，財政經濟方面「不吝多多指教」。黃溯初則虛與委蛇，跟汪精衛敷衍敷衍，打了幾手太極拳。由於他和高宗武，上海市商會會長徐寄廎，都是浙江永

嘉同鄉，他祇好去找徐寄廎暗中商量。徐寄廎問明白黃溯初的意思，他想託一位喫得開，兜得轉的大亨，一手包辦高宗武脫險離滬，並且和重慶方面取得聯繫，徐寄廎當下就對他說：

「目前能够順順當當辦好這兩件事的人，就唯有杜月笙先生了。」

黃溯初雖然去國已久，長住日本，但是杜先生的鼎鼎大名，他也是聽說過的。所以他毫不游移，立刻就請徐寄廎幫忙，跟杜先生接洽，問他可有意思，承攬這件大事？徐寄廎辦事非常機密，他不曾通過我，和杜先生連絡，請剛從香港回到上海的徐采丞先生，再走一趟回頭路，風塵僕僕的重到香港，當面跟杜先生一說。杜先生曉得此事非同小可，便專程飛往重慶，晉謁蔣委員長，得到委員長的指示以後，旋又匆匆返港部署一切，他親自訂定周密的計劃，一份份的密電，再拍回上海來。

高陶事件舉世震驚

從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到十一月初，「日汪密約」談判了整整一個半月。汪精衛手下的第一員大將陳公博，經不起汪精衛的再三催促，也從香港抵達上海，由於他的參與談判，使雙方進度為之加速。十二月三十日黃昏，「日汪密約」正式簽字。出席簽字的，偽政權方面有周佛海、梅思平、林柏生和周隆庠。日方則為影佐禎昭、須賀、矢野、犬養健。圖窮匕見，面臨攤牌。黃浦灘上魔影幢幢，刀光霍霍，高陶二位先生，就此危機四伏，朝不保夕了。

當時，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，護送兩名重要人物，離滬赴港，我既不知道那兩位先生？也不曉得內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所做的，祇不過是預備兩張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四日，由上海駛香港的「胡佛號」輪船船票，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，交到這兩位先生的手裏，從接過船票的一剎那起，出動弟兄，保護他們的安全，直到胡佛號離開上海為止。胡佛號上，則杜先生另有安排。所以二十九年元月初轟動世界的高陶攜帶日汪密約脫險抵港事件，最重要的一個階段，擺脫敵偽的嚴密監視，完全是高宗武、陶希聖兩先生，憑他們的機智與勇氣，所獨力完成的。等到他們兩位一腳踏上海佛號，我的任務即已終了。實際上我祇代買了兩張船票，在碼頭上作了一次嚴密的戒備而已。後來，方始由高陶兩位先生告訴我，他們都是用的金蟬脫壳之計，舉重若輕的完成了脫險的第一步。譬如陶希聖先生，他就是在那天早晨，算準了時間，由家裏乘汽車到國泰飯店，叫司機在外面等一等，然後走進前門穿出後門，再僱出租汽車到黃浦灘碼頭，神不知鬼不覺的登上胡佛輪，平安出海。

「日汪密約」原件，是經由高先生的內弟沈惟泰先生，拍成了照片，攜來香港的。但是到高宗武、陶希聖兩先生脫險抵港後，仍還不能公開發表，使世人獲知日本軍閥的猙獰面目，和汪偽政權的賣國罪證。因為，陶先生的一家門，包括陶夫人和大小姐琴蕪、大公子泰來、三公子恆生四公子晉生和五公子范生，都還留在上海。密約遽然發表以後，她們母子六人必定性命難保，所以

必需在密約發表之前，把她們先救出來。然而，元月四日高陶二先生離滬，五日清晨汪精衛他們就得着了消息，當時他們還不知道密約已被攝影帶走，可是已經嚇得魂飛天外，大為驚惶失措。陶先生的寓所，立刻就加派便衣偵探監視封鎖，廚子被調開，傭人不許出門一步，在陶宅四週戒備嚴密，如臨大敵。汪精衛他們分明是在以陶先生的家眷作人質，箝制他不得發表不利於他們的談話，洩露密約的內容。在他們來說，這便是唯一阻止密約外洩的手段，「亡羊補牢，猶未為晚」，事實上他們也不能一錯再錯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要想把陶先生的一家大小毫髮無損的救出來，那豈不是比登天更難？

寫到這裏，真不禁為杜月笙、高宗武、陶希聖三先生的從容部署，密切配合深感由衷的敬佩。難怪「日汪密約」公布，高陶脫險的全部故事傳遍世界各國，駐重慶的英國外交官，首先盛讚中國情報工作的巧妙，實已表現國際大間諜的最高技能。往後各國訓練諜報人員，也都以此一事件列為專題研究。

首先是高宗武先生的妙手盜約，由於在「日汪密約」逐日磋商時期，敵偽雙方早已對高陶二先生採取防範措施。雙方指定專人，日方矢荻，汪方梅思平，負責保管文件，而且每次開會都有雙方特務多人嚴密監視，不容有一張小紙片攜出會場之外。所以，參與會議的日僑與羣奸，沒有一個人相信密約原件會得外洩的。直到元月二十三日香港大公報發表「日汪密約」，日僑羣奸當時在青島舉行分贖會議，犬養健、矢野、清水、

扇、和朝日新聞記者神尾茂，正在青島市郊海光寺餐廳午餐。周佛海先通電話旋即趕到，他一見那幫日本人就說：

「我對不住你們！」

當場便放聲大哭，矢野拿起大公報略略一閱，還很自信的說：

「這不是真正的全文，不過是他們每天根據會議情形，回家去寫下來的。我們何妨公佈其真相，有以對抗！周君，你祇是哭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失敗了。」

三連環的脫險妙計

由於磋商密約當時，戒備無懈可擊，方便矢野在密約公開以後，都還以為是高陶二先生憑記憶所筆記。在他們看來，負責保管密約原件的只有兩個，一個是梅機關的第二號人物矢荻中佐，絕對不會有問題，一個是周佛海派的第二號頭目梅思平。梅思平跟周佛海一樣，澈頭澈尾的一心要當大漢奸，他們對日本人一面倒，唯命是從，一切決無異議。而且他還是汪偽政權中最機警權變，精明幹練的一員，他的才幹和歷練汪記集團無人可及。梅思平行事有派頭，說話極得體。曾有一次，由「周派」更上層樓，跳槽「公館派」的李士羣，時正一手掌握軍政大權，很想施梅思平以致命打擊，特地在汪精衛跟前，報告梅思平經辦的某一件事，已經引起外間輿論的非議。梅思平本人也在座，像這樣不提其名的當面指控，手條子是相當毒辣的，因為控方和被指控都在，汪精衛就不能不裁定是非，當場攤牌。所以汪精衛聽後

祇好一個熱馬鈴薯拋給梅思平去，轉過臉來問他道：

「你看這件事怎麼辦呢？」

任何人碰到這種場面，不是抗聲答辯，便是俯首認罪，兩者俱將導致不利於己身的後果。唯獨梅思平，他能若無其事的答一句：

「請先生以不變應萬變。」

「以不變應萬變」，恰是汪精衛不久以前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裏的得意警句。當下聽了，汪精衛竟是連連的點頭，一場劍拔弩張的風波，被梅思平輕易的渡過。連李士羣也唯有在事後語人：「那梅思平果然厲害，我說了十句八句，也不敵他一句哩。」

像這樣精明厲害的角色，也祇有時年三十三歲的高宗武先生才鬥得過他，把他奉命保管的日汪密約，一頁頁的拍成照片。

前文說過，因為陶希聖先生一家六口陷身虎穴，「日汪密約」遲遲未能發表，必需等到陶夫人她們脫離了龍潭虎穴，方克功德圓滿，漂漂亮亮的打這一次大勝仗。照說，在敵偽嚴密監視之下，把陶夫人母子六位救出，實在是難於上青天。然而，杜先生却自有他三連環的錦囊妙計，陶夫人尤其有胆有識，智勇兼備，她打電話到愚園路，跟陳璧君直接通話，要求見一次面。陳璧君答應了，她便如時前往，和陳璧君侃侃而談，她說她平時只顧家務，不懂政治，對於陶先生的事向不過問。又否認陶先生起先有離開上海的打算，理由是陶先生果真要離開上海，為什麼會在兩個星期以前，把她們大小六口從香港接了來？當陳

壁君擔憂的說：

「香港是是非之地，他這一去，難免不說話。等到他一篇文字發表，那就遲了。」

陶夫人立刻因風煽火的答道：

「我相信他不會輕易發表什麼的。我決定自己到香港去，連勸帶拉，要他回上海。」

果然陳璧君當面就推托了，她說：

「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。」

陶夫人便似有意若無意的說：

「我這趟到香港，只帶兩個小的孩子去。留下三個大的，免得就誤他們的功課。」

陳璧君何等機伶，她一聽就懂得，陶夫人是自願留下三個孩子，充作人質。自古有道是：「虎毒不食子」，普天之下決沒有做娘的割捨兒女，自家去逃生的道理。陳君璧居然中計了，陶先生的六口家眷，放三個走，留下三個，陶先生陶夫人決不能捨下孩子不要。那麼，陶先生多半會跟陶夫人一道回來，偽政權尚未開鑼之前的一大危機，說不定將會順利解決。因此，她請陶夫人坐一坐，自己起身上樓，過了一歇，她和汪精衛一齊下樓進了客廳。

陳璧君喫了洗脚水

見過了禮，重新落座，陶夫人便向汪精衛再度提出她的要求，汪精衛起先還不肯答應，雙方正在討論，——我們那邊却算準了時間，一封急件送到汪公館。內定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拆開了一看，大喫一驚，立刻跑進客廳交給汪精衛。

汪精衛接過信來，一瞥之下，頓時臉色大變

，他把信遞到陶夫人手上，說：

「請妳看看。」

陶夫人故意的搖了搖頭說：

「我不識字，看不來信的。」

汪精衛點點頭，頓時就改了口說：

「好的，妳帶兩個孩子，到香港去走一趟。

見到了陶先生，妳跟他講，只要他回上海，任何條件都可以辦到。還有，請妳在一個星期之內，給我一個確定的回信。」

陶夫人如願以償，大喜過望。她當天就買好船票，帶着最小的兩位公子：晉生和范生，乘法國郵輪赴香港。三連環的錦囊妙計已經有兩條奏效，八個人之中救出來了五個。

——汪精衛在會晤陶夫人時所接到的那封信，設計之巧，安排之妙，令人拍案叫絕。原來，那是陶先生的一封親筆函，請汪精衛保障他留滬家屬的安全，倘若敵偽方面胆敢陷害他的家屬，那麼陶先生就唯有走極端。汪精衛頂怕的就是這一着，「日汪密約」公布與否這張王牌，始終還是捏在高陶兩位先生手裏的啊。

三連環的錦囊妙計用到最後一計，香港那邊比較輕易，上海這頭可就要費點手脚了。杜先生給我來了一個電報，儘速設法營救陶先生的三位男女公子離滬赴港。陶先生派了一位曾資生先生到上海，和我聯絡，如何將三個孩子救出虎口。我先打聽汪精衛方面的動靜，獲得確悉，汪精衛、周佛海已經離開上海去青島。——事後方知，汪精衛一行離滬之前，陳璧君收到陶夫人的一個電報：「希聖即可借返上海。」他算是喫下

一粒定心丸，就此和周佛海北上。當時，在淪陷區裏，早由土肥原一手包辦，成立了兩個偽組織，北平有王克敏的華北臨時政府，南京有維新政府梁鴻志。汪精衛不甘寂寞軋一脚，日方乃在青島召集三方面開會，協調「統一」，所以汪周是到青島出席很重要的羣奸分贓會議的。

汪精衛周佛海一走，上海的大小漢奸鬆了口氣，乏人監管，自然鬆懈，正是展開行動的大好良機。我坐了汽車，親自到環龍路陶公館附近一帶查勘，發現陶公館門前正在修馬路，壓路車機聲隆隆，日夜不休，藉的想出了一條計來。

再打聽清楚了陶先生在上海有妹夫一家，住在滬西開設煤舖，是三個孩子的姑父姑母，心中想起的這一條計就更有了把握。我定好一條義大利郵輪的一個房艙，買好四張票，然後把曾先生請來，兩個人咬次耳朵，我告訴他如此這般行事。

曾先生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電話，叮囑她如何按部就班，從容出走。陶小姐又跟她的兩位弟弟密議一番，事畢，泰生和恆生兩位公子聲聲的說外面壓路機太吵，無法做功課也睡不着覺。陶小姐被他們吵得「沒法」，便跟監視人員講明了，把她兩個弟弟送到滬西姑母家住一天，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們上學。監視人員聽她說她把弟弟送去就回來，當夜由她看家，果然不疑有他，命司機開車子到滬西兜一轉。陶小姐絕不耽擱，交代清楚立即原車回到陶公館。

一夕平安無事的渡過，次日一早，我調集一批弟兄暗藏槍械，化裝為各色人等。再叫祥生汽車公司準備三部出租汽車，一部由我用，兩部停

在杜月笙先生的杜美路公館圍牆外，一月煤球工廠的前後出口，司機一律用我們自己帶鎗的弟兄。我把當日出動的弟兄分成三撥，二十個人在十六舖碼頭，二十個人在煤球工廠。我那部出租汽車上，有兩名槍法最好的保鏢。

陶氏三姊弟突圍記

我當時的盤算是這樣的，那天一大清早，我便帶兩名保鏢，叫司機把車子開到霞飛路西段陶小姐學校的後門口，等陶小姐由汪精衛派的監視人員護送她上了學，她會按照曾先生昨天所傳的話，不進課堂，學陶先生的樣子，走進大門穿出後門，坐到我等好了的車上，飛車疾駛。萬一被汪精衛的人發覺，我們就一路且戰且走，直駛杜美路，那邊我埋伏好了二十名槍手在等他們，不難一舉解決。然後，再去滬西接陶泰來和陶恆生。「七十六號」縱使聞訊急起大隊來追，他們決不會想到我們突然來個向後轉，不去碼頭而去滬西。

接到了陶小姐果然平安無事，我們便直趨滬西，接陶泰來與陶恆生，再度前往十六舖碼頭並不彎路的杜美路煤球廠。倘若有追兵，我們就藉煤球廠的煙霧騰騰，近在咫尺，不辨面目，用二十名槍手擋住追兵不許越雷池一步。前門進後門出，後門進前門出，反正兩頭都備得有接應的車輛，儘可保着三個孩子換車上碼頭。如果根本無人察覺；我決定也在煤球廠換車，三個孩子一人一部。至於為什麼要「多此一舉」？攤開來說：無非防個萬一，我不能讓三個孩子一齊犧牲於亂

槍之下。換言之，也就是逃得出一個是一個。

托天之幸，杜美路換車也能過關的話，那就三部車各載一個孩子，直奔十六舖。碼頭附近，也有二十名槍手隨時備戰，擋住追兵。然後，三個孩子分乘三隻舢板，各有三名保鏢，護送上義大利郵船。

那一天行事順利已極，我假想中的四處槍戰全都沒有發生。陶氏三姊弟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一個個都那麼沉着鎮靜，刀兵不驚，就這麼一路無阻的衝出天羅地網，逃到了駛往香港闖家團圓的郵船上。最後的囑咐，是上船以後人各一處，相互裝做不認識。不論發生任何情況，也不能將內心的感受，流露於神色之間。

義大利郵船啓碇了，我和我的兄弟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肩上的千斤重担，暫且卸下。

元月二十日，陶家三姊弟歡天喜地的到達香港，元月二十一日，日汪密約正式發表。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滋先生，親自從重慶飛到香港主持發稿事宜。

密約發表，舉世震驚，成為抗戰時期轟動一時，影響廣遠的重大事件。汪周兩派人物的懊喪，日本政府的尷尬，自屬不難想像。「日汪密約」原本是東洋人喫牢汪精衛簽訂的，其中最大陰謀，便在於將基本和約與戰時協定混而為一，所以「條件」會得那麼苛刻。等到我方把「密約」發表以後，東洋人飽受國際輿論的抨擊，他們迫不得已，只好照汪精衛他們起先的意見，把基本和約跟戰時協定分開。汪精衛賣國，總算挽回了不少利權來，淪陷區的同胞，因此不知少喫了

多少苦頭！

民國二十九年元月二十三日，蔣委員長為揭佈「日汪密約」發表告友邦人士書，正告友邦：「中日新關係調整綱領」之日汪協定，將根本取銷各國在東亞之地位。美英法等國立起響應，紛紛發表聲明：決維護九國公約，否認汪偽政權。尤其抽調部隊，增強遠東地區防務。美國且兩度貸我美金四千萬元，開始支持我國對日戰爭。算算收穫，着實不小。

不過，在私人方面，高宗武先生英年有為，不愧浙中健者，但是他却自此絕迹政壇，飄然去了美國。陶希聖先生在香港住了將近兩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香港陷於日軍之手，指名逮捕，逼市大索，經歷了不少的艱難危險，方始全家突圍而出，輾轉而到重慶，繼續在中央供職。

杜月笙先生也為高陶事件付出相當的代價，首先是使僕僕風塵，兩度飛渝洽商。第一趟由重慶飛香港時，座機猝遇日本飛機襲擊，機槍猛射，險象環生，幸虧駕駛員鎮定異常，技術高超，他使飛機攀高到八千公尺，方始逃過了這一關。然而高空氣候驟降，杜先生就此得了嚴重的氣喘病，痼疾纏身，直到他病逝之時為止，那份病苦之罪，真是很不好受。

李士羣到香港刺杜

其次是經此事件後，汪精衛把杜先生恨之入骨，他口口聲聲的說：

「我跟他有什麼難過，他竟這麼樣來對付我！」

他曾交代周佛海，叫「七十六號」的第二號頭目，「狼客」李士羣，專程赴港，指揮所部暗殺杜先生。

巨耐李士羣再狠，終究門不過安居香港堅尼地台，冠蓋畢集，勝友如雲的杜先生。幾次三番下手都不得其門而入，終於廢然而返黃埔灘。

第三是汪精衛、周佛海一計不成，再生一計。賄買香港差館還會一度派人上杜公館搜查，使杜先生相當光火。

故行政院長俞鴻鈞，抗戰以前當過上海市長，當時他正以中央信託局局長的身份留港公幹，聞訊即以國民政府非正式代表之名，向香港總督提出備忘錄。說明杜先生時任行政院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、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、交通銀行常務董事、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，分明是中國政府高級官員，享譽國內外的社會領袖，據而指斥香港警察的非法、無禮舉動，香港總督接到俞鴻鈞的備忘錄後，立刻表示道歉，並且保證今後不致再有類似情事發生。汪精衛的人又落個沒趣而同。

至於奉命跑腿，出點微力，在高陶事件中卑不足道的區區在下我哩，承蒙陶希聖先生在他的篇章裏面提起過，使我得着莫大的光榮。尤其他還情詞詭譎，令我極為感動的這樣寫着：

「……當然，我更關心萬墨林先生在上海的情況。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，他在大馬路金山飯店門口被捕，他被帶到四馬路捕房，虹口日本憲兵隊，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。他被灌開水，上老虎機，受盡各種殘酷的刑訊。他始終不肯

供出蔣伯誠以及其他地下工作同志的住址和姓名（註）。」

「（註）墨林的腦子裏，記住很多朋友的住址和電話，他是地下抗戰工作者的總交通。若是他放鬆一句話，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捕。」

陶希聖先生又說：

「當時，杜月笙先生着人帶口信，給『七十六號』一班人，說了這樣的三條：

「一、我們總有一天要見面，你們應該留下見面之情。

「二、你們要幹，大家幹！

「三、銅鈿麼，好講。

「這三條果然有效，墨林的朋友們花了法幣十六萬，以後墨林便免於拷打。最後由金鼎勛奔走說項，交五十三家商店聯保，才獲保釋。

「這是他第一次被捕，第二次是在三十一年之多。當時，蔣伯誠先生在上海中了風，住在福

履理路。伯誠的太太首先被捕，墨林和曹俊、王先青等十幾位同志同時被捕。墨林被帶到貝當路日本憲兵隊。因為他患慢性腹膜炎，轉大西路宏恩醫院，再轉西蒲石路，與伯誠們住在一起，便於養病，經過了六個月，才被釋放。」

陶先生的溢美之詞，我真是感激之至。不過，我在上海為地下工作人員跑腿，隨時都有被捉殺頭的可能，我的兩度牢獄之災，並不一定就是為了高、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。而且彼此都為國家民族，引頸一快，死而無憾。時在美國的高宗武先生，刻在台灣陶希聖先生，和他的公子千金，對我來說，只有讓我分享一點點光榮的大德，絕對沒有欠我的情。我的兩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關聯的，充其量，不過敵偽雙方早曉得我沾過「高陶事件」一些些光，想起當年他們自己的狼狽情景，在修理我的時候，手腳來得重一點罷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章君穀著 袁世凱傳

——一代梟雄——

業已出版

分裝一、二兩冊
合售叁拾陸元

袁世凱以一名五品同知的捐納官，於光緒八年到朝鮮逃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他在朝鮮十二年間，是他一生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家章君穀先生搜集史料，全部以生花妙筆寫成袁世凱傳中最精彩的一段，自在本刊連載，附以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定價一、二兩冊合售叁拾陸元。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。